

大众周末

■ 新闻关注



母子三人练
高难度花式瑜伽

美国拉斯维加斯女子萨默·佩雷斯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组她与儿女一起做花式瑜伽的照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女摄影师周游世界
发现各国平民女神

女摄影师Mihaela Noroc周游世界,为不同国家的平凡女性拍摄肖像照。图为伊朗女子,身着传统波斯服饰在清真寺参加一个庆祝活动。



汪星人过万圣节
盛装出行萌翻众人

美国纽约,民众在曼哈顿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参加年度万圣节,狗狗盛装出席吸人眼球。



男生吃仙人掌
竟然还直播

一个外国小哥直播吃仙人掌,不是去皮去刺后炒了吃,而是生吃带刺的。这酸爽,也是没谁了。但不一会儿,他就疼得龇牙咧嘴。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彼得·汉德克是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被认为是当代德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这位文学大师也是毕希纳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获得者。2004年“诺奖”得主耶利内克曾说,“汉德克是德语文学活着的经典,他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月22日下午,在北京798艺术区,汉德克与中国学者、文学爱好者一起面对面。本报记者参与对话,并采访了研究汉德克作品的学者和译者。

好玩的汉德克,难读的汉德克

□ 本报记者 逢春阶 刘一颖

北京798艺术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二楼大客厅是平的,没有“主席台”,高大的彼得·汉德克坐在椅子上,但后面的人看不见。作家邱华栋试探地问:“很抱歉,对话时,您能站起来吗?”于是,汉德克就不停地站起来回答,坐下来听题,然后再站起来,再坐下。

汉德克风度翩翩,一头有点儿蓬乱的白发,很像个音乐指挥家,又像一头雄狮(邱华栋语),右手握紧的拳头不时地晃动。

“如果有可能,我很愿意步行到中国来”

在对话现场,记者有幸与汉德克的老朋友,九卷本《汉德克文集》主编、德语文学资深研究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韩瑞祥先生坐在一起。韩先生从2008年起就跟汉德克交往,他说汉德克直来直去,很率真。“这个人不好接触,他喜欢的人,他愿意交往,他不喜欢的,就拒绝接触。有时候说话,非常尖刻,但有时又很幽默,很好玩。”

从汉德克走上文坛迄今,实际上一直处在争议包围之中,但汉德克从来不理睬褒贬。韩瑞祥介绍,汉德克一直遵循我行我素、独来独往的生活和写作模式。“作为一个作家,他在文坛上向来受到方方面面的争议。1966年所写的戏剧《骂观众》,从头到尾演示着对传统戏剧的否定。因此,当初初出茅庐的年轻汉德克,也凭借此剧声名鹊起。”汉德克的姿态,让记者想起作家张贤亮自满荡荡的话,不怕争议,越争议越精彩。

韩瑞祥接触汉德克比较早,上世纪80年代,他就在汉德克所居住的城市里求学。“当时我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上学,第一次读到汉德克的作品。我觉得他和巴赫曼、贝恩哈德等都是当代德语文学的佼佼者,所以一直关注他们的创作。”韩瑞祥说第一次见到汉德克,是2010年初,在柏林苏尔坎普。

韩瑞祥说,对汉德克作品的研究,还得从主编《汉德克文集》说起。“世纪文景想在中国介绍汉德克,他们知道我一直是从事奥地利当代文学研究,希望由我牵头来主持编选。”正式接过主编任务以后,就开始在国内寻找进行汉德克研究的学者或译者。

“从2008年开始迄今,一共有16位译者参与了汉德克的作品翻译。”韩瑞祥介绍,译者全部是国内大学德语专业的教授、副教授,也有个别是博士。

引介汉德克到中国,并非一帆风顺。韩瑞祥说,汉德克曾对将自己的作品翻译到中国有所犹豫:“能不能在中国找到那么多真正读懂我作品的译者?”韩瑞祥说,汉德克不了解中国的德国文学研究现状,这套文集陆续出版之后,读者的反响让他打消了此前的顾虑。

汉德克其实是中国的老朋友。在本报记者的书架上,有1984年诗刊社主编的《世界抒情诗选》,这本书介绍了57位包括莎士比亚、歌德在内的抒情诗人,最后一位诗人是汉德克,诗歌是绿原先生翻译的《颠倒的世界》。经典的句子至今有诗人在模仿,如:“我醒着人睡了;我没看东西,是东西在看我;我没动,是脚下地板在动我;我没看见镜中的我,是镜中的我在看我;我没说话,是话在讲我;我走向窗户,我被打开了……”

在戏剧的舞台上,上世纪90年代一小批热衷于实验戏剧的年轻人疯狂追随汉德克,孟京辉就曾表示,汉德克是他“愿献犬马之劳”的大师,他导演的剧作《我爱XXX》便不难见到《骂观众》的影子。孟京辉说:“汉德克的作品,我记得当时是1991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在北大的德语专业的朋友,把他的作品翻译了。那个时候翻译成《侮辱观众》,也翻译成《辱骂观众》。我们看完后很震惊。”

对话现场,汉德克机智幽默,引来阵阵笑声,他说:“三十年前,我四处旅行,希望把事情记录下来,像今天我不太喜欢旅行,我现在只去步行能到的地方,如果有可能,我很愿意步行到中国来。”

“下次读的时候,你抄50页……”

汉德克几乎对每一个提问者都要调侃一句,然后很严肃地回答,透出一种睿智。比如对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提的年轻人面对焦虑的问题,汉德克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只有上帝知道。”一位提问者,问他的写作习惯,汉德克说:“这个问题,你可以问给任何一个作家,他们回答的可能都不一样,但都同样无聊。”本报记者也问了个



问题,汉德克劈头一句:“你的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提问的是:“中国的小说家、读者,很注重故事性,包括莫言先生也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但看汉德克先生的小说,几乎没有大故事性,好多人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我一开始读《缓慢的归乡》的时候,读不进去,就逼着自己抄,抄到20多页,才读进去。我就想,汉德克先生的小说,就像一个核桃一样,需要把坚硬的壳砸开,才能找到那个味道,中国作家和德语作家,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您老是强调史诗性的叙事,但我读的时候,好像理性的东西更多一些。让我想到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想到了托马斯·曼的《魔山》,但中国的小小说老是强调要有故事性,要有可读性,我现在挺困惑,特想请教。”

汉德克是这样回答的:“全世界只有一种文学,没有中国文学和德国文学这样的区分。其实,我读过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并不是这种所谓讲故事的文学。在我看来,讲述就是讲述,如果一个作家说,我就是个讲故事的人。那是自谦吧。在中国,在德国,讲述是一样的。我不喜欢,或者是我痛恨讲故事这个词。荷马史诗他也在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是在讲述,但他们不是讲故事的人,他们的作品不是讲故事的文学。不能把文学按国家来区分,中国文学,或者德国文学,只有一种区分,就是全世界都认可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歌德的《亲和力》这样的作品,也不是以讲故事为目的的,它是世界文学。”汉德克一停顿,微笑着说:“我的小说,难读,下次读的时候,你抄50页。”引起全场笑声。

汉德克补充说:“只描述外部世界是不够的,留下来的文学作品都是描述内心世界的,同样这个也是在文学创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你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平衡。”

韩瑞祥教授说,汉德克先生的小说确实不好读,没有我们中国小说所谓的故事性,可读性。讲故事其实是浮在上面的,而他说的讲述是潜在下面的,他强调的是感知这个世界。比如一把椅子,有的作家会描述这把椅子的形状,材料,颜色,花纹等等,这都是客观的。而汉德克不去描述,他是去感知,是去感知椅子给他带来的感觉。椅子和我之间有一个地带,或者是灰色地带,汉德克把它准确地表述出来,这样比客观的描述,更耐人寻味,更有深度。”

现场担任翻译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张晏,她对记者说,德语文学本身不注重故事性,注重思辨,这与德语文学传统有关。“汉德克曾经说,我喜欢阅读难懂的小说,轻松的作品不属于文学,那是供人消遣的。”

“我是一个关于蘑菇知识的世界冠军”

汉德克的叙事作品《试论疲倦》,其中有一篇《试论蘑菇痴儿》,塑造了一个对蘑菇着迷发狂的人物,从好奇、痴迷、癫狂,再逐渐到冷静、抽离、解脱,汉德克借此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回顾与反思。

记者也注意到汉德克的“蘑菇情结”。在小说《缓慢的归乡》中,小说主人公索尔格吃晚餐,有一段:“这顿晚餐吃的是野外作业时采回的浅褐色蘑菇。这蘑菇吸收了不透水的永久性冻土中的一些许湿润,味道与中国蘑菇相仿……”

为什么味道与中国蘑菇相仿?记者很想问问这个蘑菇问题,正在发急之时,有位读者站起来问:“您为什么对蘑菇感兴趣?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青年根本不知道乡村的蘑菇是怎么长的。”

缓慢站起来的汉德克说:“我自己是一个关

于蘑菇知识的世界冠军,我认识所有的蘑菇品种,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兴趣爱好,这是一种痴迷,兴趣爱好这个词是个很讨厌的词。就好比说,我热爱蘑菇,找蘑菇这件事,如果到了夸张的程度,他就变成了一种痴狂,我替生活在城里的中国孩子感到遗憾,没有办法去认识村里的蘑菇,我也向大家道歉,我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不知道中国青年人是不认识蘑菇的。”又是一片笑声。

汉德克1942年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但他有乡间生活经历,而在乡间的生活,就跟蘑菇沾了边儿。

翻译张晏在对话结束后,给记者发来一幅照片,照片上的汉德克赤脚蹲在地上捡蘑菇,左手提着方便袋,右手将蘑菇拿在手里端详,而他的赤脚下,是散乱的蘑菇。

张晏说:“汉德克过着很传统的生活。”

“阅读就是这个世界的心”

10月16日,汉德克在上海说:“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对我来说,文学是阅读的,而鲍勃·迪伦是不能被阅读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反对书,反对阅读。我不想让人误解,我还是会认为鲍勃·迪伦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比丘吉尔、肯尼迪还要伟大。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是对文学的侮辱。这个决定很显然是一些不读书的人作出的。鲍勃·迪伦的词,如果没有音乐,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坚持语言本身的东西,这是我的基本立场。”

在北京,有读者问汉德克,作为一个读者,怎么样读别人的书,喜欢哪些书?

汉德克说:“我现在说的这番话并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我是一个专业级的读者,作为作家,其实我更是一个门外汉,也可以作一个比喻,作为读者来说,我可能像一尊佛像,但是如果作为作家,我可能只是个小蜗牛或者小麻雀。这个比喻里的大小比例大概就能说明我作为读者和作为作家的分量。对于我来说,阅读就代表着我的生活,一位来自于19世纪的著名的作家约瑟夫·艾辛多夫,德国的一位诗人,他也是一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诗就是这个世界的心’,但对于我来说,阅读就是这个世界的心。对我而言,生活不是去电影院或者去博物馆,而是作为一个孤独的阅读者,我现在到中国已经有十天了,我现在非常想念阅读的时刻,因为在旅途当中比较难以专心去阅读。对于我来说读报纸不是阅读。我也曾经非常喜欢读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作品,我更喜欢读迪伦马特的长篇小说,对马克斯·弗里施的作品来说,我更喜欢读他的日记,而不是长篇小说。我认为还有个比这两位更为伟大的作家——罗伯特·瓦尔泽,还有19世纪的特弗特里德·凯勒,如果要是谈到我喜欢读的书,作品,我可以一直讲到今天晚上可能都讲不完。但是谈到这样的话题,更好的是两三个好友独自的亲密的交谈,而不是面对这么多观众,就像耶稣曾经说过的,如果两三个人以我之名坐在一起,我就在你们中间,但四个人五个人就太多了。”

“重点是叙事性的创作,史诗性的创作”

汉德克写小说,编剧,又导演电影,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问,使用这三种不同的媒介,不同的媒介能够表达他(汉德克)不同的情感或者思考,还是他(汉德克)认为他的思考通过不同的媒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彼得·汉德克说:“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但这个问题没法回答。我有一种非常少见的节奏,我创作的重点是叙事性的创作,史诗性的创作。但是这个就像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枝杈,这些枝杈可能也同样重要,同样美丽,这就是戏剧创作。就是我为一些电影写剧本,但是这棵树的主干仍然是这个史诗性的叙事,我也别无选择,我的创作基本上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天性,我也非常高兴是这样一种情况,这样对于文学来说是很好的,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戴锦华感叹,也就是说,汉德克首先是一个作家。

“当我还是一位年轻作家的時候,我研究的最多的其实是我自己内心的世界,我22岁的时候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大黄蜂》,这个小说已经译成了中文。这部小说当中充斥的描述都是关于梦境、关于村庄以及战争,全都是我自己

还是一个孩子时的亲身经历。后来,出版商对我说,你不可能靠出书活着,你得写个剧本。”汉德克说,为了获得财务自由,就开始写《骂观众》的剧本。当然能写成这样一部作品,是因为当时的初恋女友也是一位演员,他常常要情愿不情愿地跟着一起去剧场。“戏剧本身带给我幻象,再加上出版商的驱使,以及我当时对披头士乐队的热爱,就有了这个剧目。其实它和辱骂没有关系,是我对演员和观众之间节奏的分析,用一种近乎音乐的关系来表达。在那之后我就成了一个勉为其难的剧作家。”汉德克刚坐下,又一次站起来解释。

韩瑞祥说:“《骂观众》是汉德克的成名作,我们通常称其为‘反戏剧作品’,因为该剧彻底打碎了传统戏剧清晰的结构模式,尤其是整个舞台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场上就只出来四个不断说话的人物,这些说话的人物其实是在跟舞台底下的观众互动,而剧场的氛气又都在跟这几个说话的人物互动,那么实际上这四个无名无姓的说话者在整个过程中是不断以各种方式来批判传统戏剧,也即是‘骂观众’。用汉德克自己的话说,是‘创造出一些熟悉的意识’,这就是他反传统创作理念的开始,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戏剧,被称为自觉派代表作(等待戈多)以来最重要的一部里程碑作品。”

韩瑞祥说,另一部具有影响性的作品是《卡斯帕》,它继承了奥地利文学的语言批判传统。“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异化人的工具,它可能由于某种社会秩序,或某种权力可以强制给人某种固定的语言表达模式,从而使人物走向异化。而戏剧人物卡斯帕就处于这样一种通过与固定的语言模式相接触,逐渐失去自我走向异化。”

韩瑞祥表示,《卡斯帕》表明汉德克对语言的社会作用持否定的态度,因为他的文学或多或少受到了奥地利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哲学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批判方面一直冲击着传统的语言意识。而汉德克在20世纪60年代的创作中,如《卡斯帕》正是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同时他也确实是通过反思这种语言模式来对整个社会交互不变的规范意识,对人思想的束缚,以及对心理上造成异化的语言秩序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汉德克又慢慢创作出一些开始带有政治倾向的戏剧,这种倾向体现在他反对通过战争、暴力等手段对文化,对人进行摧残。“20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发生剧变,发生了流血冲突,尔后北约又发动了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欧洲人对此持赞同态度。但汉德克站出来指责北约这一行径,认为战争严重摧毁了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大屠杀。因此他遭到整个欧洲的攻击。我猜测,可能由于这种政治意识,导致了汉德克跟‘诺奖’无缘。”

“我用铅笔写作,还会用橡皮”

他是艺术上的特立独行者,但是生活上的循规蹈矩者。汉德克脚上的皮鞋已经穿了36年,他说:“我现在用铅笔写作,还会用橡皮。早年,我在西班牙旅行,找到一台瑞典出的打字机,字母排列顺序,组合方式跟我用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经常打错字。于是,我决定用手,用铅笔写在纸上,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到大自然当中,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都能写。有的时候我就在荒原里面,面对着一片无人的原野写作,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当然有时也会害怕,最后回到自己家里。我对于写作本身,也有害怕,每天都有,你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写出来。我现在已经74岁了,我依然会说,写作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对我而言,依然意味着是一种冒险。”

汉德克透露,他现在有一个计划,就是要重新再创作一部类似于《卡斯帕》这样的作品,主题就是一个生活在当下的年轻人怎样面对社会,到底是世界毁灭了他还是他毁灭了世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问题。

对话现场气氛热烈,轻松愉快。汉德克先生很会调节大家的气氛。比如回答完一位女士的问题,他会说:“你的衣服穿得很很有品位。”比如当邱华栋介绍一位来宾说是“著名艺术评论家”时,他会调侃:“中国还有‘著名艺术评论家’这个职业?”引来阵阵笑声。当他回答完本报记者的提问后,回到沙发上,还摇头顽皮地做了一个鬼脸。

对话结束时,邱华栋请汉德克先生作个结束语。汉德克先生依然像雄狮一样站起来说:“非常抱歉,我们今天面对的空间没有窗户,但是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为我打开了一扇一扇的窗户。”